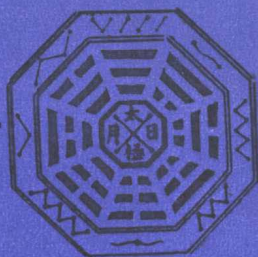


道教文化新探



卿希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道教文化新探

卿希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成都

52189

责任编辑：汪 漪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古 蓉

道教文化新探

卿 希 泰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9.25 插页4 字数220千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392-7/B·30 印数：1—1,940

定价：3.75元

前 言

50年代中期，我在四川大学担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工作，结合教学曾写过一些文章。当时一般是按几个块块来讲授这门课的。我曾试图探索一下如何从体系上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更好地有机结合起来，为此而试写过一本有关物质和意识的小册子，交给省里的一个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的过程中，因该社开展运动而中途停止，这种探索也就没有再继续下去。60年代我也写过一些哲学文章，多半是属于探讨思想方法和中国哲学史问题的，后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这些探索也不得不停顿下来。“文革”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有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又转向宗教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事中国道教思想史的探讨。这项工作实际是属于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范畴，探讨道教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以及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由于道教也和其他宗教一样，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思想不仅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且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中，它是一门和许多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交

FF/SP/34

叉的边缘学科，研究起来需要涉及的文化知识面很广，头绪非常繁多，其内容又往往是精华与糟粕杂陈，科学与谬误交织，加上各种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原有的基础又比较薄弱，因而碰到的困难甚大。在研究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这种研究特别需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是我们探讨宗教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没有它的帮助，我们的研究工作就将寸步难行。回过头来就觉得“文革”前对思想方法论的探讨，今天对我也还是具有一定的裨益。最近几年我所写的东西，已远远超过“文革”前的数量。由于工作需要，同志们建议选编为一个集子。遂从60年代关于思想方法论的文章中选了1篇，从“文革”后的道教研究的文章中选了23篇，其中已发表过的20篇，尚未发表的4篇，合起来取名为《道教文化新探》。它既反映了我大概的思想历程，也表明了我目前的研究重点。恩格斯曾经指出：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只是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才有存在的理由。从这个观点出发，为了尊重历史的原貌，我对于过去已发表的文章，这次重新发表时除在文字上作了个别校改之外，在基本内容方面均未作修改，并一一注明当时发表的刊物和时间。其中有4篇是我和其他同志合写的，也在该文之末附了说明。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此志谢。

卿希泰

1988年元月于成都

目 录

应当重视和加强宗教学研究	1
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	6
试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17
道教的源与流	30
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	40
关于道教斋醮及其形成问题初探	59
《太平经》的哲学思想	75
《太平经》的知人善任思想浅析	87
试论《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	99
《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能抹杀	110
试论《太上洞渊神咒经》的乌托邦思想及其年代问题	119
试论道教劝善书	128

中国道教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142
有关五斗米道的几个问题	151
《灵宝经》的出现与繁衍和灵宝派的形成初探	165
关于净明道形成问题 刍议	184
关于紫阳派形成问题刍议	202
从葛洪论儒道关系看神仙道教理论特点	212
王玄览道体论和修道思想的浅析	222
试论陈景元的宇宙观及其治身治国理论	233
关于道教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244
一部富有启发性的著作	255
谈谈两点论	264
有关宗教几个理论问题的综述	277

应当重视和加强宗教学研究

——为《宗教学研究》公开发行而作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这种意识形态和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客观现实在人们主观意识里的反映。不过，作为宗教这种意识形态有它自身的特点。宗教的根本特点，就在于按其本性来说，它不是正确地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而是客观现实的虚幻的、颠倒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所说：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①

过去有些资产阶级学者由于不懂得社会意识乃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他们离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考查宗教。有的把宗教说成是人类“天生的感情”，认为它是一切时代、一切人们所固有的永恒现象，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另外一些早期的无神论者和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等人，则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只是由于人们的愚昧无知，纯系一种欺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这同样也是错误的。虽然宗教是伴随着欺骗，但仅用欺骗既不能说明宗教为什么产生，也不能说明宗教为什么会长期存在。事实上，任何一种宗教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它的社会物质根源和认识论根源，有它自己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宗教也不是永恒的社会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随着人类历史的向前发展，到了共产主义时代，当一切主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它也会自行消亡，人们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这种客观规律，研究这种客观规律，不按照这种客观规律办事，在各种主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妄图依靠行政命令或其它强制手段来一举消灭宗教，这不仅行不通，而且还会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损坏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包括各种信教的群众在内，共同为解放全人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也是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如果离开无产阶级的这个根本任务，硬要主观地把反对宗教问题放在第一位，按照宗教信仰的原则把劳动群众区别开来，就会分裂群众，破坏革命，在实际上就是给宗教帮忙，更加激起宗教狂热，而不是克服宗教。还应看到，迄今为止，宗教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现今全世界42亿人口当中，各种宗教信徒便占了60%以上。因此，为了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宗教和正确地对待宗教，必须根据宗教本身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规律来制订正确的宗教政策。这都是摆在一切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非常现实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就有赖于加强宗教学研究。可见，关于宗教的研究，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来说也是如此。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道教有18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有1300多年的历史，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鸦片战争之后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信教的群众，在我国总人口中、特别是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中，比重虽然不是很大，但它的绝对数字仍然不小。宗教问题在我国仍有一定的群众性。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就更为普遍。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那里的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所以，在领导这样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如果我们对宗教问题不进行认真的研究，对它缺乏深刻的认识，便不能够正确地掌握宗教政策，从而也就不可能很好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前进。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影响。所以，宗教学又是一门和许多学科互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等等许多问题。每一个交叉点都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方面，都需要对它进行研究。以道教为例，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儒学和外来的各种宗教特别是佛教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并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和古代的化学、医学、药理学、养生学、老年学、气功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农民运动等等，都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不研究中国道教思想史，便不能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更不可能全面地了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与文化思想的演变。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深入开展这各个方面的研究，这对于全面地总结祖国的文化

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也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在我国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同时也是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几大宗教，在许多国家中都有它们广泛的社会影响。道教虽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亦曾流传海外，传播到朝鲜、日本、印度和南洋一带，而道教的经典，更是远播欧美。所以，它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最近若干年来，关于道教思想的研究，国外许多国家的学者都非常重视，建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创办了专门的研究刊物。因此，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日益扩大，加强宗教思想的研究，对于广泛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也是十分必要的。而目前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上，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更须值得我们注意。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宗教问题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视的，他们写过许多专门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对此也十分强调，他还把对于宗教的研究，作为加强党对于宗教工作领导的一项战略性任务提出来。1959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认真研究宗教的问题。1963年，他又就加强宗教研究问题作了批示，要求我们对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的世界三大宗教进行研究，并建议成立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宗教研究机构，出版一些可以看的有关刊物，希望有更多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各种宗教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出现，并强调指出：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是非常深刻的，其意义也是极其深远的。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加强宗教研究的指示，在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强调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对宗教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是党的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宗教理论研究队伍，努力办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有关专业，是党的理论队伍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认真学习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面贯彻中央的这些指示，必将导致我们更加深刻、更加科学地认识宗教这一社会现象，更好地掌握党的宗教政策，这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发展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宗教学研究》杂志也是在中央这些正确指示的指引下创办的。先是作为内部的学术交流，已经出版了6期，从现在起，经上级批准在全国公开发行。它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借助它，希望能够在开展有关的学术讨论，提高学术水平，以及发现人才，培养队伍，促进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上，争取作出一点贡献。

（原载《宗教学研究》1985年第1期）

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

宗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不曾有宗教存在。现今全世界42亿人口当中，各种宗教徒便占了半数以上。如何正确认识宗教和正确对待宗教，这是为了推进共产主义运动所必须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宗教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时候，最早也是从批判宗教神学开始的，并以这个世界观为指导，深入地研究了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科学地论述了宗教存在的社会物质根源和认识根源，深刻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克服了旧无神论者在宗教神学问题上的唯心史观的基本缺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无神论，从而把无神论对于宗教神学的批判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无神论者，不了解宗教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根源，认为宗教是无知的产物，因而指望用启蒙的方法去克服宗教，认为只要普及教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就可以达到消灭宗教。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并不仅仅是由于无知，而是有它的社会物质基

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是社会压迫和自然压迫的结果。因此，反对宗教的斗争不能只用启蒙的方法，而应该针对它的物质基础、针对它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物质根源，即消灭社会压迫和克服自然压迫。为此，一条是进行社会革命，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使人民从社会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社会的主人，自己当家作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一条是进行自然革命，发展科学，大力提高生产发展的水平和科学文化的水平，使人民从自然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的主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相联系而提出反对宗教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神论的宣传，反对宗教的斗争，应当服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和自然革命的根本任务。当宗教的社会物质根源还存在的时候，部分群众仍然处于宗教的影响下，这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是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包括信教的群众，共同为实现这两个革命的目标，为解放全人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离开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硬要主观地把反对宗教的问题放到第一位，按照宗教信仰的原则把劳动群众区别开来，就会分裂群众，破坏革命，在实际上就是给宗教帮忙，更加激起宗教狂热，而不是克服宗教。187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在批判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发表的宣言，企图用法令来禁止“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时，明确指出：这种“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仰的最好手段！”是“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①。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既无情地批判了杜林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所作出的让步，又严厉地斥责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2页。

他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一切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恩格斯指出,这样向宗教宣战,就是“帮助它殉教和延长生命期”,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①。因为这样一来,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无产阶级忽视革命的根本任务,转移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其结果,必然会妨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理论,发扬了批判宗教神学的革命精神,并结合当时俄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同“左”的虚无主义和右的“造神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制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宗教的基本政策和策略,初步总结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宗教神学作斗争的经验。列宁指出:“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限于抽象的、思想上的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②“应该使反宗教斗争服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③。又说:“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一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应当通过宣传教育来进行斗争。斗争搞得过于激烈会引起群众愤恨;这样的斗争会加深群众在宗教问题上的分裂,而我们的力量则在于团结”^④。他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6页。

② 《列宁文选》第3卷,第378页。

③ 同上书,第384页。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3页。

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应当使教会同国家完全分离，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像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①“每个人不仅应该有相信随便哪种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应该有传布随便哪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哪一个当官的都管不着谁信的是什么教；这是个人信仰问题，谁也管不着。”^②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每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政治斗争中，对宗教问题都很重视，作了认真的研究，为党制定了正确对待宗教的方针、政策。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便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正确地分析了封建势力和神权的关系，主张把反对封建政权的斗争同反对封建神权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使后者服从于前者。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所构成的“神权”，它和“政权”、“族权”、“夫权”一起，是“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③。因此，毛泽东同志把对神权的冲击，看作是湖南农民运动所做的十四件大事中的一件，予以热情地赞扬，并进一步分析了破神权同农民运动的关系，指出：“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6卷，第36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页。

发展而普遍。……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①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②事实很清楚，在农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时候，由于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找不到摆脱苦难的现实道路，使他们“不得不把委曲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③，幻想有神灵来保佑他们，而封建势力却正好利用这种幻想的神灵来吓唬和麻醉他们，于是神权便成为封建势力统治农民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科学地分析了神权与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正确地指出了“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宗教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不必“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他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④这就是说，要引导群众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放在第一位，使群众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革命运动中提高思想觉悟，自觉自愿地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决不能采取强制手段或行政命令的方法去禁止宗教。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促使宗教消亡的基本观点，也体现了同宗教神学作斗争的长期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3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4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35页。